

9

董大中
文集

文化圈层论

山西省作家协会◎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卷外借

董大中
文集

文化圈层论

山西省作家协会 ○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大中文集·第9卷, 文化圈层论 / 董大中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78-5066-7

I. ①董… II. ①董…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文化哲学-研究 IV. ①C53 ②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482 号

书名: 董大中文集·第9卷·文化圈层论
著者: 董大中

出版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陈学清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总字数: 3190 千字

总印张: 207.75

版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3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66-7

总定价: 498.00 元 (全 10 卷)

《董大中文集》编委会

主任：张明旺 杜学文

成员：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项目负责人：杨占平







者在书房(2011年4月12日)

1985年和美国学者、赵树理研究专家马若芬在一号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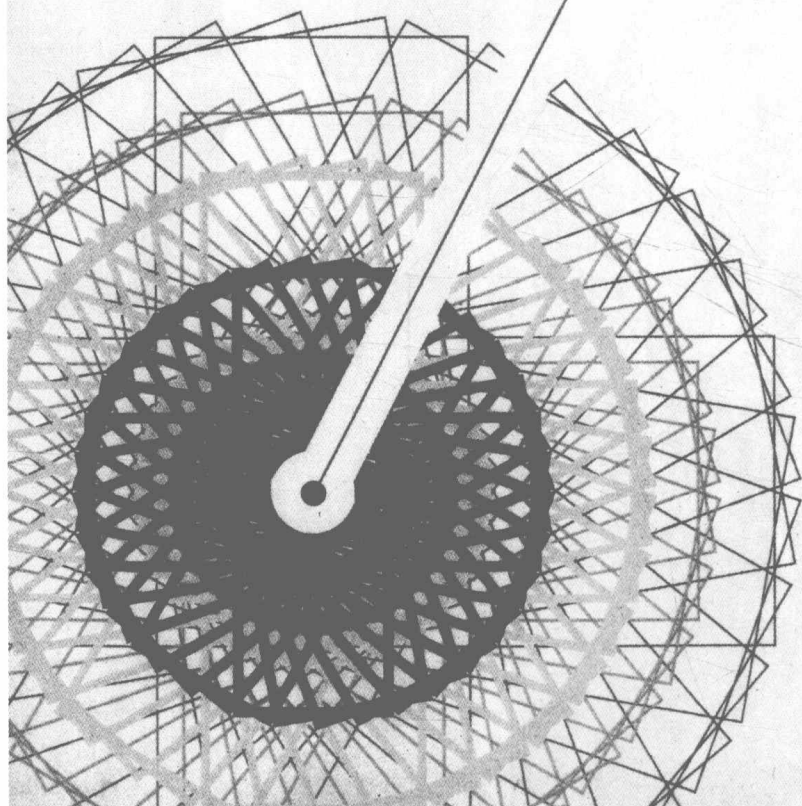
日本著名学者、日本赵树理研究专家、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现会长加藤三由纪女士2015年4月专程来太原看望作者,二人在太原市南华门十五号“赵树理旧居”合影

文化 圈層論

董大中／著
【人類】系列之一

Concentric Circles of Culture

反思中國
超越西文化
關注全人類
發展之最新力作



自序

这多年来我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在拿出这么一本书，可能会使一些朋友觉得奇怪。但既然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又是“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梁漱溟语），在这方面说一些个人的想法，最自然不过。这本书正是我思考文化问题的一本试卷。

我立意写这本书，是在十年以前。起因是在清末以来的中西文化论战中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用法和阐释很不相同，有时相差甚远。为了对中西文化论战问题有更深切具体的感受，我对李敖做了专题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台湾中西文化大论战中，李敖作为一方大将，发表了许多文字，对方发表的文字更多，双方论争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那样的大论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不可能发生，这也就使这场大论战成为中国中西文化论战史上最近的一次，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也就在李敖研究中，我对文化问题有了较多的思考，形成了现在这本书的主旨和基本框架，随即提出了“文化圈层论”这个理论。

不敢说有多大的价值。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没有系统读过这方面的著作。好处是，它可以使我少受束缚，不理睬已有学派、思潮的说辞，想到什么说什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自然，书中难免会有常识性错误，可能会让行家贻笑大方。但有一点感到自信，就是只写自己所思所想，不因袭他人。凡所沿用或引用，都一一注明来源，不敢掠人之美。笔者追求的学术品德是发现，尽量多说一些从他人著作中看不到的话。我的信条是，为增长知识而读，为解决问题而写。三十多年来，我搞完一个课题，就另搞一个，目的正在于此。写完之后，自觉任务完成，拍一拍屁股，一走了之。不同的是，在这个“矿区”门口停留的时间长了些，而且短时间不会走开。

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本书所说的文化，是最广义的文化，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限于精神层面的文化，那样，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其二，本书所使用的术语，有时跟其他著作相同，其含义却完全属于本书，不能跟其他著作相类比。在文化人类学上，“文化圈”和“文化层”一类术语，时常可见。比如梁启超就有“中国文化圈”之说。日本学者石川荣杏等人著《现代文化人类学》，详细介绍了文化圈学说。本书“文化圈层”，既跟“文化圈”不同，亦跟“文化层”有异，切不可当作以上两个术语的合称。还有如“制度文化”等，本书也自有其独特的含义。

不言而喻，这本书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民族的，而是着眼于全人类。偶有说到某个国家时，只不过举例而已。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正席卷全球。日益发达的旅游事业，更使不同肤色、不同地域的人们，成为交流、对话的伙伴。曾经被当作“爱国主义崇高行动”的“使用国货”，在许多国家，变成了历史。千百年各自独立的文化，要继续保持“独立自主”，关门锁国，已不可能。原来互不相识、互不联系的人们，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正在靠近，趋同。生活在“欧盟”国家的人们，已有“天下一家”之感。中国古圣先贤提出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并不像一些人说的“乌托邦”，正在向我们招手。这就是当今的世界。这就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

我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只求把我的思考记录下来，不至于被洪水淹没。即使被锁在箱底，我的目的已达，任务已毕，于愿已足。我感到欣慰的是，当这本书还没有动手写作、仅仅在《董永新论》里做了主旨概述并用本书的理论对“孝”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简单评述，刘锡诚先生就在序文中说：“窃以为，老董的这个‘文化圈层论’说的提出，其在我国相对滞后和薄弱的文化学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对董永故事的文化学个案的剖析。”正是刘锡诚兄的这段话，鼓舞我把这本书写了出来。掩卷深思，我该不会辜负老友的期望吧。

希望听到海内外行家的批评。

2011年6月6日，三闲居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百年中西文化大论战回顾	001
	——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晚清的变法图存运动：大论战的序幕	001
第二节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的讨论	005
第三节	“全盘西化”论种种	014
第四节	从《宣言》到《宣言》	021
第五节	一九六二年台湾中西文化大论战	028
第六节	“文化圈层论”的形成过程	035
第二章	轴，或说核心：人的自我解放	041
第一节	文化：人的自我解放的产物	041
第二节	人的自我解放四部曲	050
第三节	在文化的光谱上	059

第三章	制度文化	061
第一节	制度文化、核心文化、第一种文化	061
第二节	文化的组织者和整合者	063
第三节	“变迁因素” “物理宇宙”	068
第四节	制度文化是全人类的	076
第五节	个人与制度的兴废	082
第六节	制度与人	086
第七节	次制度及其特点	090
第四章	工具文化	098
第一节	工具文化的基本构成	098
第二节	工具文化的特点	118
第三节	工具文化与人	137
第五章	习俗文化	143
第一节	范围广泛的文化	143
第二节	甲类习俗	144
第三节	乙类习俗	164
第四节	习俗文化的特点	165
第五节	习俗文化与民族特色	167
第六节	习俗背后长长的历史	173
第七节	习俗文化与人	177

第六章	比较与辨析	182
第一节	三种文化，作用各不相同	182
第二节	文化的强制性	186
第三节	文化的全人类性	190
第四节	工具性和阶级性	194
第五节	民族文化，文化与传统	200
第六节	文化的延续、发展和变异	206
第七节	功能的转化	213
第八节	文化认同和对异文化的认识	216
第九节	文化的惰性	221
第十节	重说“全盘西化”及其他	225
第七章	交流与融合	237
第一节	从“文明的冲突”说起	237
第二节	以我为主，积极吸取，保持民族特色	245
第三节	二十一世纪是政治整合的世纪	250
参考文献	255

第一章

中国百年中西文化大论战回顾

——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晚清的变法图存运动：大论战的序幕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既掀开了中国人屈辱的一页，也打开了中国人接受新事物、新文化的大门。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等，一次又一次的赔款、割据，使封闭已久的“天朝”中国跟外国的联系一下子多了起来，也使中国从一个虽然封闭却仍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痛定思痛，人们忽然觉得“泰西”各国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或利用之处，于是产生了研究介绍“西学”和运用“西学”的热潮。

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侮，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保国保种，在现代化的枪林弹雨下生存下去。魏源是其中一人。魏“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成《海国图志》一百卷。”（《清史稿》）魏在该书中提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筹海篇》）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叙》）的方略，在另一文中说：“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集》上册第206页）。跟魏源有同样经历（一同抵抗英帝国主义，又同遭失败而退下来）的林则徐有相同的话：“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见《筹办夷务始末》）这里的“师夷”“师

敌”，都含有承认自己不行的意思，要向人家学习。比林、魏二人更激进的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中已看到时局的严峻，感到需要一场革命式的变革，不过他在一八四一年就逝世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开始发起组织了“同光新政”，即人们常说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以组建新式军队、从西方引进机器和技术、革新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用李鸿章的话说，是：“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促使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的，还有另一种动因。有人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之长，使人想到夏商周三代。孔子有“克己复礼”之语，是“复”先代之“礼”，在孔子看来，以前的人们分等级，知尊卑，讲仁义，遵王道，敬长爱幼，父慈子孝，道德面貌高尚，社会秩序良好，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不堪回首，所以要回到过去。在中西方有了交流之后，人们发现，当下的中国不仅国力衰微，技术落后，船不坚炮不利，而且在道德风尚上，也远不如“夷人”。由于中国人所接触的西方人大都是西方的高等人物，有绅士风度，讲究礼节。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宪政，国家机器运转有法可依，议会制度能充分发扬民意，不像中国，人民意志从来不受重视，宫廷斗争让人惨不忍睹，加之当时慈禧大权独揽，皇权旁落，人们敢怒不敢言，这自然加深了人们对西方一套政治制度的羡慕心理和移植要求。洋务运动的兴办，使欧美国家的新思想、新文化纷纷介绍进来，为立意改革的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思想资源。郑观应、王韬等人把眼光转向国家的政治制度。郑著有《盛世危言》，他在《叙》中说：“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用心……”王韬在《重民》中把一些欧美国家实行的君主立宪制称作“君民共主”，要求在中国推广，“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两人所说“上下”，连用语都是相同的。王韬多次说，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郭嵩焘更有“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等论述。薛福成、谭嗣同等人也都有类似言论，他们所说“唐虞以前”“三代以前”如何等等，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最好注释，也说明这一点几乎成了当时所有变法图强者的共识。

当时那股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被称作“中体西用”论。郑观应在前引“育才于学校”一段话后接着说：“……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前者，他当作“体”者，从人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到他们所想要实行的立宪政治，后者，即他当作“用”者，限于技术层面。后由沈毓桂、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方针。它是把西方文化的碎片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躯体上，以补自己的不足。这意味着，学习西方文明，包括近代科学技术、工商制度、教育制度等，都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而为我所用，并不是把它作为自己的骨肉，骨肉仍是中国的“圣教礼治”，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东西。接着，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从学术角度思考问题，开始对两千年来统治中国人民心灵的古代文化发生怀疑，他把“数十篇”古圣先贤之文称为“伪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他甚至说“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这就有对“中学”的否定之意。

这时引进的西方文化，既有技术层面的东西，也有理论方面的东西，还有欧美一些国家的制度、风情，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出生于山西小官僚家庭的徐继畲，到福建任职以后，眼界大开，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他所听说和从手绘地图中看到的世界各国情形。书中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极为赞赏。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其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第9卷）该书于一八四八年刊刻问世，以后多次翻刻，流传极广，并很快传入日本。其影响远超过魏源的《海国图志》。作者“张眼看世界”的广阔胸怀深入人心。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跟这部书有很大关系。从维新派的心态上说，他们急于变法图存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主张又是杂乱无章的，也没有一条共同认可的道路。当变法触及“君臣关系”时，一些人往往显得缩手缩脚。另外还有些人心灵上的“文化自我重心论”的阴魂不散，常常跑出来骚扰。

这一场“大变局”，可说是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西文化相碰，这并不是第一次。十八世纪末叶，大英帝国为给乾隆皇帝祝寿，派出马戛尔尼勋

爵率领的庞大使团来华，就被法国著名学者、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称为“两个世界的撞击”，他在《停滞的帝国》一书里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把中西文化碰撞分为七期，说：“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又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独秀文存》第37页、38页）

以上所述，大致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过半个世纪。曾廉以“言技”“言政”“言教”把它概括为三个阶段：“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上杜先生书》）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用“学术”“政治”“伦理”三个词概括其先后借鉴的重点。还有其他三阶段论的。从纵向看，国人的认识还算步步深入，不断推进。那以后，行动多于言论，像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成立翻译机构等都是。最大的动作，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这场大变革最后失败了，但改革的车轮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反而在多方面展开。一九〇一年八月，废除八股取士。九月，诏令各省设立学堂。随即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一九〇二年，由新任命的管学大臣拟定《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定形式公布的完整的学校章程，从蒙学（相当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人们把这一章程称为“壬寅学制”。“废科举、兴学校”是在制度文化上的一次成功改革，它使流传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被彻底埋葬。法制上，从一九〇一年（光绪廿六年）冬天起，就开设修律馆，“择西法之善者”（上谕中语），既改革旧的法律，又制定新的法律，包括《大清民事诉讼法》和《大清新刑律》在内。实行宪政，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成了一些改革派的主要诉求，像康、梁等人就积极主张君主立宪，清廷也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

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说：“……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对帝俄的胜利，更使中国的西化运动获得新的鼓励，这时聚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近五万人，东京已经成为新知识的中心。国内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